

# 理性与暴力:对恐怖主义 六种策略的分析

魏英杰

**内容提要** 暴力恐怖是一种旨在达成特定目标的策略工具,在与国家对抗的过程中,实力的结构性差异决定了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必须是策略性的。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恐怖分子使用威胁与恐吓、消耗、笼络与收买、宣传与鼓动、挑衅与分化、搅局与竞价等六种恐怖主义策略,以达到特定的政治效果。针对恐怖分子的不同策略,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反恐政策如树立威信、释放强硬信号;投入民生、挤压暴恐空间;利用网络,转守为攻;积极争取平民,避免无差别伤害;打击极端派,实现反分化,等等。

**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恐怖主义 理性 暴力 策略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危害,众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2016年1月1日,《反恐怖主义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走上依法反恐的道路。但目前反恐局势并不乐观,恐怖主义近年来愈演愈烈、波及范围不断扩大、表现形式也更加复杂,比如近几年猖獗横行的“伊斯兰国”就为众多国家的反恐政策提出了新

---

\* 魏英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邮编:200030)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能力与边疆地区反恐研究”(项目号为14CZZ016)及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号为12CG14)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石斌、李振、樊鹏、汪卫华、黄琪轩等老师对本文提出的意见,以及《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修改建议。文中的疏漏和不足由笔者负责。

的挑战。<sup>①</sup>有学者对其进行针对性分析。<sup>②</sup>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青建等在分析国际恐怖主义的扩散时,利用地缘政治总结出“动荡弧”的概念。<sup>③</sup>恐怖主义行为的演变和学者们研究的新进展都要求加深对恐怖主义的理论化提炼。笔者认为,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应当从其暴力行为的策略性入手,把握其中机制,做到主动应对与预防。众多案例证明,恐怖分子利用恐怖暴力事件来迫使政府或其他行为参与者妥协,以达成其政治目的。例如,1993年,为响应联合国的决定,美国特种部队在索马里展开行动,抓捕阻挠和平进程的头目法拉赫·艾迪德,但遭遇当地和在基地组织受训的武装分子的突袭,造成19名美国士兵死亡。这一事件导致美国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再愿意参与到国际维和行动中。“爱尔兰共和军”原本是一个分离主义的暴力组织,但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英国政府的强力镇压后,组织骨干加入了绝食、罢工等非暴力手段,最后迫使英国政府让步。以上案例说明恐怖分子在特定环境下,会策略性地利用特定行动或方式来达成其目的。

本文对大量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案例和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出恐怖主义策略的六大类型,并提出恐怖主义的实质是恐怖分子与“敌对国家和社会”的策略性互动,对“什么是恐怖主义?”“是否是理性的?”“恐怖分子是否具有理性的一面?如果他们是理性的,恐怖分子如何使暴恐活动的效能最大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 一、引言:争论中的“恐怖主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形成严格统一的标准,这也导致对恐怖活动的“策略性”和“灵活性”把握不够准确。从概念上看,较为常见的恐怖主义概念首先来自于官方定义。例如,《牛津在线英语词典》是依循历史脉络来对恐怖主义下定义的——“恐怖主义是系统性的恐怖。第一,执政党利用政府直接实施恐吓,专指1789—1794年间的法国政府。第二,非官方或未经授权地使用暴力和恐吓,以达到政治目的;被政府或统治集团使用的手段

---

<sup>①</sup>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Report*, 2016, p. 6; 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130—156页;严帅:《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41—47,62—66页。

<sup>②</sup> 刘乐:《“伊斯兰国”兴起与国际安全新挑战》,《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第71—73页。

<sup>③</sup> 刘青建、方锦程:《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5—118页。

(通过准军事、非正式武装群体),从而对特定人群实行控制;也有秘密的或是旅居国外的群体常用这些手段来进一步实现其目的。”<sup>①</sup>近些年,对恐怖主义最流行的定义来自于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通常是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或秘密组织,为了影响特定的受众,实施的有预谋、有政治目的且针对非战斗人员(non-combatants)的暴力行为。”<sup>②</sup>当然以学术标准来看,这一概念还较为粗糙。例如,该定义只强调了恐怖分子的“政治动机”,却没注意到有些恐怖行为不仅仅是受政治驱动,还可能是出于宗教、复仇等目的。还有学者指出,“秘密组织”也包括各国的间谍人员,并不一定都是恐怖分子,这种说法也缺乏严谨。此外,也有批评指出这一说法忽视了恐怖主义对人们的心理影响。<sup>③</sup>

与官方定义相比,学术界的描述更为具体。1988年,曾任联合国预防恐怖主义部门主管官员、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员亚历克斯·施密德(Alex Schmid)向学者发出关于“定义”恐怖主义问卷,以总结学术界的共识。在这本被高频引用的《政治恐怖主义》一书中,对恐怖主义是这样叙述的:“恐怖主义是一种焦虑激发(anxiety-inspiring)的重复使用的暴力手段。它被秘密个体、团体或国家行为体所采用,为独特的、违法的或政治原因而实施……暴力的受害者一般是随机(机会目标)选中或从目标群体中有针对性(具有代表性或象征意义的目标)地被挑选出来,作为消息的传递者。”<sup>④</sup>2004年,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伦纳德·温伯格等学者将施密德的定义与三本关于恐怖主义和政治冲突的重要学术期刊中所有出现“恐怖主义”的文章进行比对,<sup>⑤</sup>通过检查是否出现一致的关键词,来确认研究领域关于恐怖主义概念的共识在操作中是否存在。<sup>⑥</sup>经过比对,他们对“恐怖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动机主导下的策略,包括使用威胁、武力或暴力;在这个过程中,追求公开效应是至关重要的。”<sup>⑦</sup>这一定义强调恐怖主义是作为一种活动或达成目的的方法,而弱化了其对大众心理影响

①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Alan B. Krueger and Jitka Maleckova, “Education, Poverty and Terrorism: Is There a Causal Conn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7, No.4, 2003, pp. 119-144.

③ Alex P. Schmid,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errorism Research*, Routledge, 2011, pp. 42-45.

④ Alex P. Schmid and Albert Jongman, *Political Terrorism: A Research Guide to concepts, Theories, Databases, and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 28. 施密德共收到了109个学者们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⑤ 三本期刊分别是: *Terrorism* (1977—1991),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990—2001),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1992—2001)。

⑥ Leonard Weinberg, et al., “The Challenges of Conceptualizing Terror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16, No.4, 2004, pp. 779-781.

⑦ Leonard Weinberg, et al., “The Challenges of Conceptualizing Terrorism,” p. 782.

的关注。

施密德在《劳特里奇恐怖主义研究手册》中再次讨论“恐怖主义”概念的多样性。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在理论上,恐怖主义的定义是无法达成共识的,因为定义的过程本身就已经被卷入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的论战中”。<sup>①</sup>更有趣的是,一些学者还会反问“告诉我你认为什么是恐怖主义,我再告诉你,你是谁。”<sup>②</sup>施密德显然并不认同以上观点,因为如果没有被大部分人都接受的定义,那么,恐怖主义的相关研究就会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虚无主义。施密德再次向92位学者发出问卷,试图寻找共识。经过梳理,施密德总结出恐怖主义:一方面,恐怖主义指一种教条(doctrine),它是(施暴者)关于恐惧形成的战术或强制政治暴力的一种假定有效性;另一方面,恐怖主义是指经过算计的阴谋实践、情感流露式的直接暴力行为,并且不受法律或道德的约束。为了使不同受众及其敌对方受到宣传和心理上的影响,恐怖组织常常将平民和非武装人员作为暴力的受害者。<sup>③</sup>简单来说,施密德将恐怖主义分为“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这一定义着重强调恐怖主义在心理层面的破坏性,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9·11”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新认识。但在笔者看来,它不恰当地忽略了恐怖主义的终极目的性,或者说恐怖分子自身认定的“成功”是什么?是为了推翻现有政权、争取独立,还是受到极端思想的控制?这些都需要加以说明,否则将无法区分恐怖活动的多样性,以及恐怖分子为达目的会选择何种策略。更重要的是,这种所谓的“共识”是否存在,也是有疑问的。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塞班尼斯(Nicholas Sambanis)在区分恐怖主义与内战时,<sup>④</sup>就引用了桑德斯的定义,认为这才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德州大学教授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提出,恐怖主义指“预谋使用或威胁使用超常的暴力和残忍手段来恐吓、威胁特定受众,以达到政治目的”。<sup>⑤</sup>他并未区分恐怖主义的攻击对象是“战斗人员”或“非战斗人员”。通过回顾一些具体案例,可以看出恐怖分子攻击的对象不仅限于平民。据统计,在1965—2005年间,西欧各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人数为4539人,其中“战斗人员”(combatants)占到2083人,

---

① Alex P. Schmid,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errorism Research*, p. 42; 何秉松、廖斌:《恐怖主义概念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第45页。

② Alex P. Schmid,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errorism Research*, p. 42.

③ Ibid., p. 86.

④ Nicholas Sambanis, “Terrorism and Civil War,” in Philip Keefer and Norman Loayza, eds., *Terro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Open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76.

⑤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 and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World Economy*, Vol.26, No.6, 2003, pp. 779-802.

为总数的45.8%。<sup>①</sup>近年来,中国境内的恐怖分子也将攻击对象延伸到国家权力机关,例如,2013年6月26日,在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的暴恐事件中,暴徒先后攻击了派出所、巡警中队和镇政府,造成2名公安民警身亡及21名民警和群众受伤。一系列的暴恐事件表明,恐怖分子并没有将攻击对象限定为平民。

可以看出,学界对恐怖主义概念并未达成共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无休止的概念争论中。对恐怖主义做定义时应当注重其目的性,以及恐怖分子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即强调恐怖主义与其目标群体的互动,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所贯穿在暴力行为中的“工具理性”。乔治城大学教授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曾说:“(尽管恐怖分子有着众多的目标和动机),但拥有一个相同特征: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不是随机的、也并非没有目的。每一个恐怖分子都希望将他们的行为在大众中造成最大影响;并且,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使目标群体受到恐吓及被迫服从……因此,恐怖主义是一种获取大众注意力、并利用公众效应来传递信息的暴力行为。”<sup>②</sup>在分析自杀式恐怖主义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提出恐怖主义总体上有两个目的:赢得支持者和胁迫对手。接着,他又按照暴力行为的目的性将恐怖主义划分为“展示性恐怖主义”“破坏性恐怖主义”及“自杀式恐怖主义”三种类型。<sup>③</sup>即便是采取自杀式这种最为激进的手段,恐怖分子也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性,“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实力要弱于对手;他们的政治目标相对其战术而言,是被一个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武装人员与其‘战友’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忠诚关系、并献身于领导人;他们还拥有一种激发和仪式性的系统,使成员可以表达他们对集体的忠诚程度”。<sup>④</sup>

综合所论,本文将恐怖主义定义为:具有一定组织化的理性个体或群体采取以暴力为主的手段,制造恐慌、破坏秩序,以达到胁迫对手或使目标对象改变政治态度或政治行为。该定义主要强调:恐怖主义行为是为实现特定目的的理性行为。恐怖主义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恐怖分子在与国家力量对比中明显处于劣势,所以,他们无法采取常规战争或者游击战的暴力方式;其次,恐怖分子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如寻求政策、领土及政体的改变等,而是制造恐怖、破坏秩序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最后,为达到目标,他们选择袭击对象主要

<sup>①</sup> 数据来源:“国内恐怖主义受害者”数据库,Domestic Terrorist Victim, at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hdl:1902.1/14717>, 2018-04-20。其中战斗人员指军队、警察和民兵。

<sup>②</sup>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3-174.

<sup>③</sup> Robert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Random House, 2005, pp. 12-13.

<sup>④</sup> *Ibid.*, p. 11.

基于“效能最大化”的策略考虑,而不是单纯的杀戮。恐怖分子在这里是一个抽象概念,指恐怖主义行为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组织。恐怖分子是中英文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抽象概念,例如兰州大学沈晓晨博士和杨恕教授在《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激进化研究主要路径述评》<sup>①</sup>一文中,界定“恐怖分子”来源于“接受支持暴力恐怖行为的伊斯兰极端解读或具有相似心理特质的人群”,这里的恐怖分子是个抽象概念,指的是具有一定特征的个体集合。这些个体可以自己实施恐怖行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参与特定组织来实施袭击的;两位作者在对“新恐怖分子”进行说明时,列举的典型案列为特定具体的“基地”组织。例如,在《2016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中,<sup>②</sup>恐怖事件(terrorist incidents)既包括组织实施的袭击也包括个人实施的袭击。当然,从实证角度来看,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恐怖分子是组织。<sup>③</sup>因为杀伤力较大、影响严重的恐怖事件大都是由恐怖组织策划并实施的:第一,只有具备一定的组织规模,恐怖分子才有制造重大伤亡的能力;第二,从逻辑上讲,也只有获得一定的影响力,才有可能与国家进行“策略性博弈”。斯坦福大学教授玛莎·克伦肖(Martha Crenshaw)在讨论恐怖主义的心理状态时写道:“(有关恐怖主义研究)的其中一个基本发现是,恐怖主义根本上是一个组织行为。它通常不是由精神病态或者个体性格所导致。相比较个体而言,共同拥有的意识形态信念和组织团结特征更重要地决定了恐怖行为”。<sup>④</sup>因而,现实中较少出现作为个体的恐怖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受到特定恐怖组织的影响而实施暴恐行为的。本文的分析对象为抽象意义上的恐怖分子,具体而言是以恐怖组织为主。

下文将对大量案例进行系统性总结,从实际案例出发详细阐述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策略的特点和机制。通过对具体事件进行情境还原,建构出对恐怖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 二、恐怖主义所实施的策略内涵

恐怖主义行为本身从人道角度是不能接受的,暴力恐怖所造成的经济、心

---

① 沈晓晨、杨恕:《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激进化研究主要路径述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36-43页。

② 《2016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第12页, <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7/02/Global-Terrorism-Index-2016.pdf>, 2017-07-15。

③ 且大部分恐怖事件都是由几个重要的恐怖组织策划实施的,根据《2016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2015年共有274个恐怖组织实施了恐怖袭击,而所有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的74%是由其中4个组织发动的袭击造成的。详见《2016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第三部分,第49页。

④ Martha Crenshaw,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An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1, No.2, 2000, p. 409.

理损失也十分巨大,但恐怖分子并不是一群毫无理性的疯狂行为体。第一,从心理学的角度,恐怖分子并非精神病态。通过对德国军事暴力组织“红军旅”(Red Army Faction)成员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其他个体(家庭、邻居、同学)的对比访谈,研究者发现,虽然大众“对恐怖分子的一般印象是疯狂、有自杀倾向或者是丧失道德感的精神变态……但是,恐怖分子与其他非恐怖分子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恐怖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比常人更高的精神疾病比例。”<sup>①</sup>也有学者指出,大众对恐怖分子的认知偏差部分缘于美国布什政府时期国家利用媒体力量对恐怖分子进行的大肆渲染,为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而做好前期铺垫。这一举动成功地建构了普通民众对恐怖分子与国家安全的错误认识。<sup>②</sup>第二,现有众多实证研究也向我们展示了恐怖分子的理性特征。兰德公司高级顾问布赖恩·詹金斯(Jenkins)说过,“恐怖分子希望众人看见、也希望众人听见,但是不希望太多人丧生。”<sup>③</sup>由于在与国家暴力的对抗中恐怖分子通常处于劣势,他们无法用武力来直接实现最终目标。恐怖分子会更加重视策略性的行动,通过展示破坏能力、对恐怖事业的“决心”等方式,力图造成情势的转变和对方的妥协。<sup>④</sup>玛莎·克伦肖指出“恐怖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政治策略的一种表达形式……它是组织出于政治和策略的考量所作出的刻意选择,而不是心理或社会因素造成的意料之外的结果(unintended outcome)。”<sup>⑤</sup>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教授伊·桑·昆卡(Ignacio Sánchez-Cuenca)和欧洲大学学院教授路易·德拉·卡勒(Luis de la Calle)2009年刊文声称,“以行为体为视角的分析中,恐怖主义是由地下政治组织实施的暴力。恐怖组织与其他政治体并无差异,他们有目标,在行动中也会受到制约”。<sup>⑥</sup>恐怖分子有着清晰的战略和政治

① Clark McCauley, “Psychological Issues in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and the Response to Terrorism,” in Chris E. Stout, et al.,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Coping with the Continuing Threat*, Praeger Publishers, 2004, p. 36.

② Philip G. Zimbardo, “A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Psychology of Evil: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Are Transformed into Perpetrators,” in Arthur G. Miller, et al.,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 The Guilford Press, 2004, pp. 35-37.

③ Brian M. Jenki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 in David Carlton and Carlo Schaerf, e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World Security*, Routledge, 2015, p. 15.

④ Andrew Kydd and Barbara Walter, “The Strategies of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No.1, 2006, p. 50.

⑤ Martha Crenshaw, “The Logic of Terrorism: Terrorist Behavior as a Product of Strategic Choice,” in Reich Walter, et al., *Origins of Terrorism: Psychologies, Ideologies, Theologies, States of Mi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0, pp. 7-24.

⑥ Ignacio Sanchez-Cuenca and Luis de la Calle, “Domestic Terrorism: The Hidden Side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2, No.1, 2009, p. 45.

目标(如推翻政权、领土诉求、政策变动、社会控制、维持现状等)。为达到这些目标,恐怖分子会设计出一系列的策略性行动。

何谓策略?本文中策略指的是“恐怖主义(组织)实现目标的路径”,与其他行为体相同,恐怖分子在实现目标的路径既包括战略,也包括策略。所不同的是,战略更为宏观,决定了长期稳定的政策方向,例如,基地组织的“大叙利亚”战略、<sup>①</sup>反殖民恐怖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这些特定时期的恐怖主义战略;<sup>②</sup>而策略则侧重中微观层面,针对短期的、具体的目标,例如,一些研究中特别关注的恐怖主义实施绑架、劫机和暗杀等手段,<sup>③</sup>“伊斯兰国”宣传手段,<sup>④</sup>“伊斯兰国”在成员招募和资金获取方面的手段,<sup>⑤</sup>在概念上就采用了“策略”一词。

与此同时,策略还包含着互动博弈的要素。策略是博弈论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实现一个具体目标的行动计划,而博弈行为中行动要充分考虑所有参与者的互动状况而定。在博弈论中,策略可以被简单地被理解为“行为体可以获得的选项”,<sup>⑥</sup>通常是为了最大化地服务于自身的偏好。在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中,行为体所选择的策略旨在影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马里兰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唯有让对手感受到如果不就范必将遭受损失或者面临雪上加霜的危险,才能使其屈服或是顺从……无论是引起非理性回击的恐怖主义式暴力,或是为了让对方信服你达成目的的决心所使用的预先策划的冷暴力。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痛苦和破坏本身,而是它们对于他人行为的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sup>⑦</sup>所以,一个成功的策略应当有能力影响和预判他人的行为,并且根据对手的反应做出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恐怖主义行动既是冲突的表现形式,也是冲突中释放信号的策略性行为。释放信号不是一个简单的举动,尤其在双方互不信任的情况下,仅靠语言的力量无法传递适当的信号,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恐怖分子都会做出一些实质性举动来让自身的行为更加可信。策略性互动中参与者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形式的手段,来塑造信号内容,以达到不同的目标。

恐怖主义在策略互动中,具有不同于其他政治互动的特质。首先,恐怖袭

① 刘青建、方锦程:《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第115—118页。

② 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第130—156页。

③ 张家栋:《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第62—68页。

④ 章远:《“伊斯兰国”:“准主权”与地区安全》,《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第47—65、143页。

⑤ 曾向红、陈亚洲:《“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与策略选择》,《国际展望》2015年第5期,第103—122、165页。

⑥ Avinash Dixit, et al., *Games of Strateg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p. 27.

⑦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

击常会采取暴力程度高、个体层面看似疯狂的自杀式爆炸——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强烈表明恐怖组织的决心。其他政治行为体尤其是常见的国家行为体是不会以自我毁灭为代价来达成目标的。其次，恐怖组织由于在与国家的对抗中处于弱势，其目标达成有赖于其他行为体的特定回应。佩普指出，在伊拉克发生的一系列自杀式爆炸是恐怖分子在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示威：“必须尽快撤出伊拉克，否则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暴恐事件促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向恐怖分子释放“永不妥协”的信号；这一强硬回应对伊斯兰世界也是一种信号，它不可避免地激起伊斯兰世界的不满，甚至一些原本对恐怖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也可能转而变成同情者。英国国王学院教授彼得·纽曼(Peter Neumann)和史密斯(M. L. R. Smith)将恐怖分子的目标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制造认知混乱(disorientation)。通常意义的大众心理认为，政府是秩序和安全的提供者。恐怖分子使用持续的暴力袭击，旨在扭曲大众对政府的传统认知，即政府从“守护者”变为无力阻止暴力扩散的“弱者”。第二步是等待目标对象做出错误反应。所谓“错误”指的是政府在暴力袭击面前处于两难境地：采取证明自身的决心与能力的强硬措施，会成为一种过激反应，引发外界不满；而采取避免伤及无辜的温和措施，又往往会被批评为无能，同时还可能招致更频繁地恐怖行为挑衅。第三步是赢得合法性。他们认为，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恐怖分子会利用现代媒体的高效宣传效率，试图“洗白”恐怖行径，获取更多的同情者；此外，恐怖分子也会成立一些草根政治组织(grassroots political organization)来笼络民众。所以，通过以上方式，恐怖分子旨在颠覆目标政府的合法性，为自身的政治主张开辟新的路径。<sup>①</sup>因为两位学者将重点放在“合法性”上，这一点似乎更有利于解释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反抗组织对侵略者所使用的恐怖暴力行为，因为理论中有着强烈的假设即侵略者的合法性较低。比如，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抵抗组织“民族解放阵线”(FLN)对法国占领军的暴力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当代恐怖主义的目的并不局限于破坏对手的合法性，甚至大多并不涉及在恐怖组织范围外的塑造自身的合法性，这就需要更加细致地厘清暴恐行为中的策略逻辑。

根据对众多案例的分析，可以从策略的目的、手段和目标群体三个维度对不同的恐怖主义策略进行归纳。例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在对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深入研究中强调自杀式恐怖主义是一种暴力型

---

<sup>①</sup> Peter R. Neumann and M. L. R. Smith, "Strategic Terrorism: The Framework and Its Fallac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8, No.4, 2005, pp. 577-585.

策略,旨在迫使目标政府修改政策,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民主国家为目标,以极端的自杀式袭击迫使敌对政府从恐怖分子所认为的自己的领土上撤离。这与本文提出的策略的三个维度相契合,其中包含了策略的手段(毁灭程度高的自杀式暴力)、策略的对象(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以及策略的目的(获取领土控制权)。<sup>①</sup> 针对本文所归纳的六种恐怖主义策略:首先,不同恐怖主义策略采取的具体手段不同,以暴力程度来看,威胁和恐吓、挑衅以及搅局采取的具体手段暴力程度较高,消耗策略所采取手段的暴力程度居中,而笼络收买、宣传鼓动则主要采取非暴力手段。第二,不同策略所针对的目标群体不同,包括敌方平民、敌方政府、己方平民、以及己方不同派别的恐怖组织,它们构成了一组互动的行为体:恐怖分子是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施暴者,不同派别之间常常存在观念、利益的差异和竞争;敌方政府是实际做出回应决策的行为体,可能强硬也可能妥协,目的是维持政权、保护民众和遏制恐怖暴力;敌方平民是最易受到攻击的对象,与政府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他们最为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和福祉;己方群众则是恐怖分子需要依靠的对象,既可以为他们寻求道义上的借口,又可以提供物质和人力上的支持。第三个维度是策略的目的,这一点是刻画策略之间差异的核心,六种策略目的各有不同,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前四者包括威胁、消耗、笼络收买、宣传与鼓动的目的性较为直接,策略的互动程度简单,后两者包括宣传与鼓动、挑衅与分化、搅局与竞价的目的则较为复杂,互动程度较高,需要其他博弈参与者(player)做出特定反应才能够实现,例如挑衅与分化,表面上与威胁采取的手段相同,都是对敌方暴力程度较高的攻击,但挑衅与分化的实现,需要引发敌方政府的无差别打击才能够实现。

### 三、恐怖主义实施的策略类型

根据笔者对众多案例的总结,恐怖分子为实现特定目标,会针对不同人群采取六种常见策略即“威胁和恐吓”策略、“消耗”策略、“笼络与收买”策略、“宣传与鼓动”策略、“挑衅与分化”策略和“搅局与竞价”策略。

#### (一)“威胁与恐吓”策略

佩普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威慑策略,旨在胁迫目标政府改变政策。这种

---

<sup>①</sup> Robert A.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Random House, 2005, pp. 12-13.

策略的核心逻辑很简单：给其反对的社会带来尽可能巨大的损害，这种损害远大于抵抗恐怖分子要求所能带来的收益，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否则，大众就会揭竿而起反对政府。<sup>①</sup> 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2016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恐怖袭击”及“成为暴恐行为的受害者”分别位列第二和第四，成为最令美国民众恐惧的事件。<sup>②</sup> 这说明，恐怖主义对人们的心理威胁是实际存在的。“威胁和恐吓”的目标人群是一般民众，主要指的是“敌对民众”。针对“敌对民众”的暴力旨在向他们支持的政府示威，并迫使政府改变或放弃既定政策。

针对“敌对民众”的暴力是恐怖分子的惯用手法。恐怖活动会打击人们的心理防线，迫使“敌对民众”向政府施压以改变政策。特别在一些山区和偏远地区，国家力量很难渗透，无法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恐怖分子会乘虚而入，将受到恐吓的大众裹挟起来对抗政府。塔利班曾在联合国援助修建的足球场当众残杀了被其称为“违反宗教法规”的人群；“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每到一地，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展示残暴的一面；“基地”组织策划并实行了臭名昭著的“9·11”事件，造成近3000名无辜平民的死亡；东突恐怖分子在天安门金水桥制造了“10·28”事件，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恐怖组织通过这些恐怖事件向世人展示武力，同时，也造成破坏“敌对政府”和普通民众心理防线的结果。此外，恐怖组织还利用其他手段来加强这种恐吓的效果，例如，“伊斯兰国”将一些在感官上带来极大刺激和冲击的视频和文字上传到“脸谱”“推特”等社交工具，从而达到“恐吓敌人”、扩大影响的目的。<sup>③</sup>

当恐怖分子在无法明确鉴别平民态度时，就会诉诸恐怖暴力来威慑，使他们远离政府，以达到控制大众的目的。<sup>④</sup>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一些“中间地

① Robert A.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Random House, 2005, pp. 27-28.

② <https://www.theatlantic.com/charts/HyLS1Thwg>, 2018-01-23. 排名前五的“最令人恐惧的事件”为：政府腐败、恐怖袭击、缺乏足够的资金、成为暴恐行为的受害者、枪支管制。

③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4/07/03/world/middleeast/syria-iraq-isis-rogue-state-a-long-two-rivers.html>, 2014-07-03.

④ Stathis N. Kalyva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9; Timothy Besley and Tosten Persson, “State Capac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Econometrica*, Vol.78, No.1, 2010, pp. 1-34. 作者认为弱国家由于无法对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市场进行制度性投资，包括建立法治、维护市场的良性运行，经济长期无法走出低迷，所以大大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Seth G. Jones, “The Rise of Afghanistan’s Insurgen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4, 2008, pp. 7-40. 作者认为阿富汗政府能力低下，导致地方军阀常常利用手中的资源扮演仲裁者，地方百姓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塔利班从而可以趁虚而入。

带”，政府无法对当地民众提供有效的保护。2004年7月，位于巴格达的一家警察局发生爆炸，而两架美军战斗机恰巧在爆炸时飞过警察局上空，它们随即被视为凶手。几分钟内，就有大批人群被动员并聚集在事故地点，高呼反美口号，声称遇难者都是伊斯兰教的“殉道士”。但证据很快显示，这次恐怖袭击是反政府武装所为，目的是恐吓前来应聘警察的伊拉克平民，阻挠他们靠近政府。<sup>①</sup>虽然这次恐袭最终真相大白，但依然给在伊拉克的盟军带来了不少道德上的谴责，同时，也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对政府丧失了信心。“伊斯兰国”对中间地带平民采取“恐吓”策略的情况不在少数，他们在2016年直接参与或煽动了96起恐怖暴力事件，其中90起发生在伊斯兰国家或是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发生在欧洲和美国只有6起。<sup>②</sup>这表明，伊斯兰国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伊斯兰国家，他们即便对西方充满敌意，但渗透到对方境内的能力十分有限；也正是基于这一限制，伊斯兰国在发起攻击时，更多的是把伊斯兰世界纳入攻击对象——以恐吓民众，大大增加民众与政府合作的成本，最终胁迫平民远离政府。

此外，“恐吓”也是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从表1可以看出，数据库中15%的杀戮是为了安全原因，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由于绝大多数是在地下活动，恐怖组织稍有不慎便会陷入绝境，因而，安全的“生命线”至关重要。出于安全原因的杀戮包括处决告密者、敲诈及对内部纪律的维护等。

表1 西欧国家不同类型恐怖主义的杀戮目的类型

杀戮类型	总数	民族恐怖主义	极左恐怖主义	极右恐怖主义	自发性治安恐怖主义
政治目标驱动	85% (3429)	83.5% (2102)	90.1% (283)	91.5% (289)	84.8% (755)
安全原因驱动	15% (607)	16.5% (414)	9.9% (31)	8.5% (27)	15.2% (135)

资料来源:Ignacio Sanchez-Cuenca and Luis de la Calle, “Domestic Terrorism: The Hidden Side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 Vol.12, pp. 31-49.

## (二) “消耗”策略

“消耗”也是恐怖分子最为常用手法之一。这是当恐怖分子感到实力明显不如对手或者和平谈判已经无望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战术选择，发动者会尽其所能地给对手带来伤害，使对手认识到继续维持现状是得不偿失的，最后

<sup>①</sup> Peter R. Neumann and M. L. R. Smith, *The Strategy of Terrorism*, Routledge, 2008, p. 46.

<sup>②</s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errorist\\_incidents\\_linked\\_to\\_ISIL](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errorist_incidents_linked_to_ISIL), 2017-06-20; <http://edition.cnn.com/2015/12/17/world/mapping-isis-attacks-around-the-world/index.html>, 2017-06-20.

接受恐怖分子的条件。所以，“消耗”的目标群体是“敌对政府”。

具体而言，“消耗”经常会针对以下两种情况使用：第一，当涉及一些非核心利益时，遭受恐怖分子实施消耗战手段的国家并不会付出过高代价，在必要时可做出妥协。非核心利益是与核心利益相对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端从一定意义上属于“不能妥协”的核心问题。<sup>①</sup> 以色列虽然长期遭受来自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的袭击，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以色列政府却始终坚持自身的政治立场，拒绝从约旦河西岸撤军。而对于一些非核心利益，国家是有可能改变强硬立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去殖民化浪潮逐渐改变了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取向，特别是继续维持殖民统治将会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以 1954—1962 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为例，起初法国军政两界反对阿尔及利亚要求独立的态度极为明确。一些主要的政治家坚决维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他们强硬的军事行动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战争逐渐在消耗着法国。到 1958 年，法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近 29 亿美元，外债超过 30 亿美元，黄金储备只有 6.3 亿美元。实际上，早在 1956 年，法国国内就开始了这场战争的争论。记者雷蒙德·卡里尔(Raymond Carrier)将殖民主义比喻为“昂贵的慈善活动”(costly philanthropy)，那么维持战争自然是弊大于利的。<sup>②</sup> 1954 到 1962 年期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采取游击战、恐怖袭击等策略，共造成接近 12 万法国军队伤亡。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法国已经无法承受巨大的投入，最终戴高乐同意在《埃维昂协议》上签字，承认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自决权。

第二，西方民主政体被认为更容易妥协，而易于成为打击对象。西方学者认为，民主国家通常更容易受到“消耗战”的攻击。民主国家在军事决策方面受到各种法律限制和舆论监督，不能随意采取暴力手段，这也致使它们的反击能力大打折扣；而当国家受到攻击时，如果它的反击能力是受制的，那么“消耗”就更容易成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莱廷(David Laitin)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恐怖分子会倾向于向民主国家发动攻击。<sup>③</sup> 这是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轻易获得恐怖袭击的情况，由于

<sup>①</sup> Andrew Kydd and Barbara Walter, *The Strategies of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No.1, 2006, pp. 60-61.

<sup>②</sup>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5-105.

<sup>③</sup> Alan B. Krueger and David D. Laitin, "Kto Kogo?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the Origins and Targets of Terrorism," in Philip Keefer and Norman Loayza, eds., *Terro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Open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48-173.

受到内心恐惧的驱动他们往往会选择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改变被恐怖笼罩的局面。民主国家的基本内在逻辑是政治领导人必须向选民负责,以求继续留任。如果领导人在短时期内无法根除威胁,那么,他就要迫于压力做出让步。在此逻辑下,“民主”国家就显得非常脆弱。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执政者的强硬程度不同也会影响恐怖分子决策的考虑。在巴拉克执政时期,以色列决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结束了长达22年的占领。但是,这一举动被哈马斯解读为巴拉克政府的“软弱”,促使这个组织在2000年9月发动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希望使以色列进一步妥协。鹰派政府的上台意味着当时国内民众倾向于一种较为激进的外交政策,不会轻易向恐怖分子妥协,消耗策略奏效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比如,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政治态度就集中代表了国内强硬派的政治理念,利库德集团宣称“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首都”。这些口号下的政策必然是强硬的。

“消耗”给“敌对国家和社会”带来重创,造成诸如经济基础受损、税收流失、投资下降、警力投入加大等的影响。具体而言,恐怖组织会采取一些手段如占领路桥设施向过往车辆收费、对大型公司进行“纵火”(arson campaign)、炸弹和勒索以增加保险费用和运行成本、破坏工业制成品和农作物的出口、对银行进行抢劫、对国家外汇收入影响巨大的旅游设施进行破坏,等等。<sup>①</sup>从“伊斯兰国”的案例来看,其持续的极端行为就极大地破坏了叙利亚的石油出口这一经济依托。虽然恐怖组织的武装人员没有技术能力维护油井的有效运行,但他们依然攫取了可观的利益,并使叙利亚政府蒙受巨大损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空袭叙利亚以前,“伊斯兰国”从石油当中获取的收入大概为每天150万美元。<sup>②</sup>另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叙利亚的石油产量从战前的每天38.55万桶,下降到3万到4万桶;天然气产量也比战前下降了40%。<sup>③</sup>

“消耗”不仅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加剧了各种社会动荡和恐慌。曾活跃于20世纪西班牙的分离主义组织埃塔(ETA)在1972—2010年间,共发动561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809人丧生。1974年佛朗哥去世后,埃塔分裂为两

---

① Christopher. C. Harmon, “Five Strategies of Terrorism,”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12, No.3, 2001, p. 42.

② 《金融时报》2016年2月29日, <http://ig.ft.com/sites/2015/isis-oil/>, 2017-05-08。

③ 《洛杉矶时报》, <http://www.latimes.com/world/middleeast/la-fg-islamic-state-oil-qa-20151206-story.html>, 2017-05-30。

个组织：埃塔政治军事(ETApm)和埃塔军事(ETAm)。前者逐渐转向和平斗争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政治化趋势；后者则仍宣称不放弃武力，认为“政治和武力是无法共融的”。“埃塔军事”的领导层认为，如果巴斯克地区的独立运动在弗朗哥独裁时期没能获得全民广泛地参与和支持，那么，在接下来的民主时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必须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从1978年获取其内部文件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考虑：“军事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敌人，因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但通过长时间的心理和物质消耗，能够迫使敌人承受疲惫和孤立，从而放弃我们的领土。”<sup>①</sup>图2显示，埃塔的暴恐行动数量在西班牙进入民主时期的前几年显著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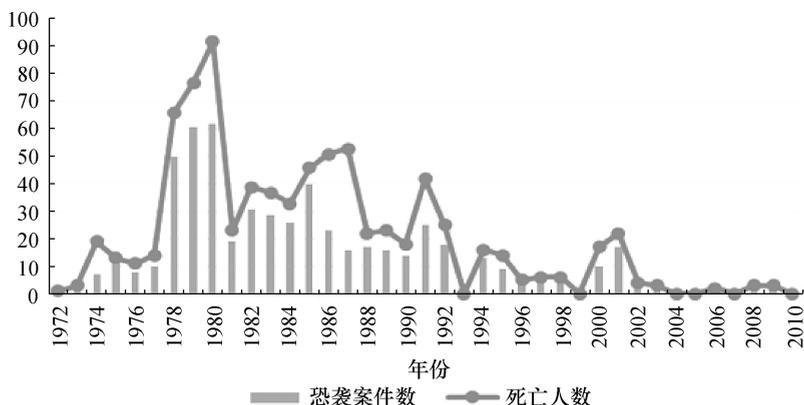


图1 埃塔恐怖袭击情况(197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数据整理，参见 <http://www.start.umd.edu/gtd/>，2016-11-23。

与埃塔属于类似性质的“爱尔兰共和军”同样也采取“消耗”策略。该组织的领导层曾经认为，只要给“英国人”带来较小伤亡就可以迫使他们离开北爱尔兰，但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是“错误的”，英国人并没有离开也没有“屈服”。所以，“爱尔兰共和军”在20世纪70年代初改变了策略。在1971年新芬党大会上，曾任“爱尔兰共和军”参谋长、时任党主席的鲁利·布雷戴(Ruairi Bradai-gh)如是说：“要成立一个由32个县组成的共和国的最佳序曲就是让北爱尔兰政府失控，以及摧毁斯托蒙特(Stormont)。爱尔兰共和军的策略要进入进攻

<sup>①</sup> Francisco Letamendia, *Historia del Nacionalismo Vasco y de ETA*, Vol.II, 1994, p. 114, quoted from Ignacio Sanchez-Cuenca, “The Dynamics of Nationalist Terrorism: ETA and the IRA,”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19, No.3, 2007, p. 295.

模式。”<sup>①</sup>这种“进攻策略”在随后几年逐渐升级,并在1977年的《绿皮书》(Green Book)<sup>②</sup>得到更加直接的阐释:消耗战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给敌人带来伤亡,迫使他们的人民要求当局撤军;通过“炸弹运动”让敌人的经济利益受损,并抑制其投资收益。<sup>③</sup>“爱尔兰共和军”策划参与的暴恐事件在1972年达到顶峰,之后虽然有大幅回落,但仍然在1976年和1979出现两次小高潮。(参见图3)如果不是英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大力加强警力和司法投入,“爱尔兰共和军”也许还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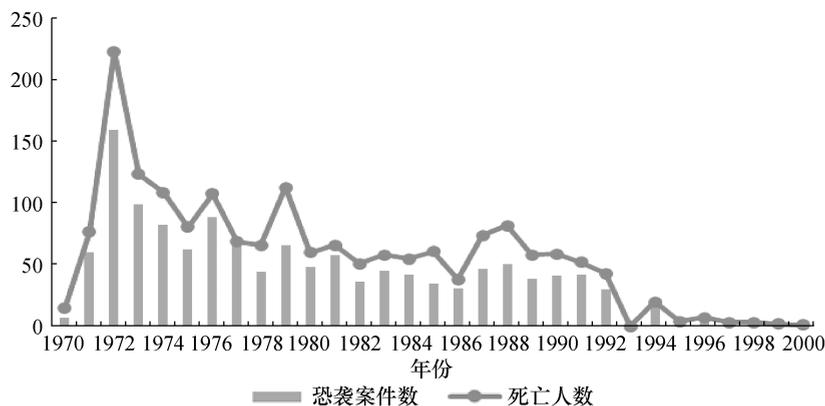


图2 爱尔兰共和军恐怖袭击情况(1970—2000年)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数据整理,参见 <http://www.start.umd.edu/gtd/>,2016-09-20。

### (三)“笼络与收买”策略

群众是恐怖分子重要的拉拢对象,失去群众支持,恐怖分子就会丧失根据。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大众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这些偏好决定了他们是否会加入恐怖组织或支持其行为。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罗杰·皮特森(Roger Petersen)对大众偏好有着精彩的讨论,“这些社群(立陶宛社群)绝不是整齐划一的……个体的行动值(threshold value)存在很大差异:一些鲁莽的人或是所谓英雄,在几乎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就会采取行动;一些人虽

<sup>①</sup> Cynthia L. Irvin, *Militant Nationalism: Between Movement and Party in Ireland and The Basque Count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202.

<sup>②</sup> 《绿皮书》(Green Book)是爱尔兰共和军为“志愿者”提供的“训练手册”,包括组织目标、行动策略等内部信息。现在普遍公认的有1955年和1977年的两个版本。

<sup>③</sup> [https://archive.org/details/IRA\\_Green\\_Book\\_Volumes\\_1\\_and\\_2](https://archive.org/details/IRA_Green_Book_Volumes_1_and_2), p. 8, 2017-04-16.

然已经准备好,但他们必须要等到社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所行动时才会参与;另一些人则不会轻易采取行动,除非看见绝大多数的朋友、邻居都已经卷入其中。”所以,就算在同一个社群,个体的“行动值”都是不同的。当然,皮特森也提出,个体行动值不是静态的,“在整个反叛过程中,由于个体所处社群的内部黏合度是不同的,他们会根据这规范性机制(normative mechanism)来改变自身对反叛风险的接受程度”。<sup>①</sup>因而,恐怖组织不但要掌握所处社群的价值结构,还会刻意地利用宗教、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甚至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去影响大众的行为。例如,爱尔兰共和军在天主教区会致力于维持良好的秩序,哈马斯会不断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医疗和教育,埃塔会积极地投身于巴斯克人的社会运动中去。这些行为就是在争取人心,改变大众对极端行为的价值判断。所以,笼络与收买是恐怖分子使用各种利益诱惑和政策手段,释放出各种“善意信号”,从而麻痹平民、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所以,在众多类型的恐怖袭击中,可以经常看见那些“奋不顾身”的自杀式爆炸和很多冥顽不化的恐怖主义支持者。在复杂的权力真空期或当地的各种秩序濒于瘫痪的情境下,恐怖分子更常会使用这种策略。

基地组织是当代最具破坏性的国际恐怖组织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它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数量开始急剧攀升;尤其在2010年,暴恐事件的数量多达100多起。<sup>②</sup>在这些恐怖事件背后,有着其首脑和组织成员的充分逻辑考量。尤其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当地形势变得复杂,教派、民族矛盾同时爆发,基地组织深知“笼络人心”的道理。2005年7月,美国政府截获了时任基地组织二号头目、现任领导人的艾麦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rihi)给其组织在伊拉克的负责人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私人信件。在信中,扎瓦希里阐明了“圣战”的两个目标:第一,短期内驱逐美国在伊拉克的势力,并建立哈里发制度;第二,推翻所有邻国的世俗政权,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哈里发。信中还考虑到如果“美国人突然撤军,必须避免伊拉克出现权力真空”等细节。虽然这封信充满了狂热语言,但也有着理性的策略考量。为达到以上目标,扎瓦希里给出三条策略性“忠告”:第一,避免无差别地屠杀什叶派教徒及亵渎他们的清真寺;第二,圣战不能仅由伊拉克人领导,因

<sup>①</sup> Roger D. Petersen,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5-47. “行动值”指人们参加反叛的行动门槛,即个体所愿意接受的风险,理论上,群体内参加反叛的人数比例越高,个人就越容易参加行动。

<sup>②</sup> <http://www.start.umd.edu/gtd/>, 2017-08-01.

为他们主要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怀而参战；第三，避免公开斩首俘虏。<sup>①</sup> 这封信的内容清晰地反映出基地组织是依照强烈的理性逻辑行事：在当时情景下，由于有着共同的“敌人”，必须摒弃教派分歧，联合“抗敌”；从长期来看，应当极力避免民族主义者主导“圣战”，因为这会阻止“大哈里发”的建立。它也充分揭示了基地领导人的战略目的和“纵横捭阖”的策略手段。

在一些国家能力极弱的地区，政府无法为民众提供医疗、教育、安全等基本公共物品，这时候恐怖分子就会打着宗教旗号乘虚而入，为生活在绝望和恐惧中的人们提供“帮助”，获取支持。塔利班和黎巴嫩真主党就是很好的例子。阿富汗从1978年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内战，之后又演变成军阀战争，民不聊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富汗内部的道路被各个军阀所据为己有，民众之间的正常商业往来必须要经过层层关卡。在国家出现结构性的瘫痪时，极端武装组织塔利班就在阿富汗青年难民的簇拥下迅速扩张。塔利班在南方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后，便打通所有关卡，将众多路障拆除，为南部地区的通商带来便利。<sup>②</sup> 黎巴嫩真主党的案例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1975年，黎巴嫩在爆发由宗教为导火索的内战，虽然战争在两年后结束，但各方矛盾从未彻底解决。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真主党于1980年代初成立，由于得到伊朗的大力支持，该组织势力也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sup>③</sup> 真主党获取“民心”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它设有社会服务部，其下有六个分别执行不同功能的次级组织：杰哈德阿尔比那发展组织(Jihad Al Binna Development Group)、伊斯兰医疗组织(Islamic Health Organization)、殉道者基金(The Martyrs Foundation)、妇女协会(The Women Association)、伊玛目阿尔马哈迪童子军(Imam al-Mahdi Scouts)和教育部门(Education Division)。<sup>④</sup> 正是通过一系列公共服务职能的开展，真主党提高了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也“鼓励”了一批青年加入该组织。

#### (四) “宣传与鼓动”策略

宣传和鼓动的目标人群既包括组织内部成员和己方民众，也针对国际社

<sup>①</sup> [https://fas.org/irp/news/2005/10/letter\\_in\\_english.pdf](https://fas.org/irp/news/2005/10/letter_in_english.pdf), 2017-03-15.

<sup>②</sup> Eli Berman and David D. Laitin,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92, No.10-11, 2008, p. 1945.

<sup>③</sup> 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已经将伊斯兰什叶派武装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这其中不仅有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还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

<sup>④</sup> James B. Love, *Hezbollah: Social Services as a Source of Power*,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

会的一些“同情者”。恐怖分子常常会对成员灌输“胜利在即”“我们必将战胜敌人”等口号，以渲染他们事业的“正义性”、提升信心，从而增强内部“整合力”并吸引更多的“信众”。针对组织以外的受众和国际社会，恐怖分子则善于以“受害者”的姿态伪装自己，将自身的暴力行为描述成“无奈的反抗”。

宗教极端恐怖主义非常善于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歪曲来获得更多支持。<sup>①</sup>例如，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组织“伊斯兰组织”(Gamat al-Islamiya)<sup>②</sup>在1996年的《宣言》中声称“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而真主对世间万物也自有安排，……(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战斗，直到真主给我们最后的胜利，就像先知穆罕穆德打败敌人，在麦加取得胜利那样。”世俗恐怖主义(secular terrorism)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恐怖分子们更多会利用“必胜”理念来不断强化自身和同伴的偏执狂想。意大利军事组织“红色之旅”(Red Brigades)成员阿德里亚娜·法兰达(Adriana Faranda)这样说道：“你说服自己去达到这个乌托邦。那么，如果要实现你的理想，就得摧毁当下的现实世界，因为它是阻碍我们的理想成真的屏障。”其指挥官帕吉欧·佩吉(Patrizio Peci)在备忘录里进一步解释：“最悲观地说，(我们的事业)在20年内就会胜利。也有一些人说五年之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当下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事情总会逐渐变好的。”<sup>③</sup>所以，无论是宗教恐怖主义还是世俗恐怖主义都会利用“画饼充饥”的手法来渲染将来的“美好”。

除了对组织内部成员进行洗脑式的说教与煽动，恐怖分子还会利用现代宣传工具来获取支持。美国杜肯大学教授克利福德·鲍勃(Clifford Bob)在关于叛乱分子如何赢得海外支持的研究中提出，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反叛组织(insurgent group)会使用各种宣传手段：首先是要让大众知晓，使自身从失语的贫穷与受压迫的世界中脱颖而出；为达到目的，他们会利用媒体提升国际关注度或者直接游说潜在的赞助者；随后，反叛组织会将自身群体要求、地方冲突、特定单一认同，以及那些并非直接与冲突有关群体的利益和计划相联系，从而放大他们的诉求。<sup>④</sup>所以，反叛组织会巧妙运用各种宣传，迎合掌握话语权的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博得同情甚至是各种形式的支持。以上逻辑同样适用于

<sup>①</sup>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92页。

<sup>②</sup> Gamat al-Islamiya 又被称为“伊斯兰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旨在推翻埃及政府，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

<sup>③</sup> “Islamic Group in Egypt,” Statement on U. S. Sentencing of Sheikh Rhman, January 19, 1996; Jamieson, *The Heart Aattacked*, p. 209; Peci, *Io, l'infame*, p. 46, quoted from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p. 241.

<sup>④</sup> Clifford Bob,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

恐怖分子,诚然,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不会轻易被掌控,但恐怖分子会利用各种宣传途径来锁定“目标人群”,以便赢得支持、攫取资源。当今最为迅速、典型且有效的手段就是网络传播。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魏曼(Gabriel Weimann)的研究发现,1998年时,美国国务院所认定的30个国外恐怖组织中,只有一半拥有网站;而一年之后的1999年,这些组织全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sup>①</sup>

因特网对恐怖组织有多项功用,都柏林城市大学教授莫拉·康韦(Maura Conway)将其总结为信息提供、资金筹集、成员沟通、人员招募及情报收集等。<sup>②</sup>2004年9月16日,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巴格达绑架了一名英国公民和两名美国公民。9月22日,英国公民肯尼斯·比格利(Kenneth Bigley)在视频中对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苦苦哀求:“布莱尔先生,我请求你的帮助,因为你是现在地球上唯一能帮助我的人。”而在9月29日的视频中,受害者的口吻发生巨大转变:“托尼·布莱尔在撒谎!他根本不在乎我,我现在只身一人,孤立无援。”最终恐怖分子仍将这三名人质残忍杀害并在网络上公布了视频。<sup>③</sup>虽然没有资料来测量视频传播及其效果之间的关系,但从逻辑上可以判断,通过视频恐怖分子向“自身阵营”和“敌对阵营”传递了不同信号:第一,虽然伊拉克被盟军占领,但“我们”仍有能力对“敌方”采取强制措施。极端分子意图让西方认识到,虽然在武力上西方具有强大优势,但仍有人敢于用暴力进行对抗,以此来渲染他们“事业”的正当性。这不但可以坚定“内部信心”,又能为组织吸引来新的极端分子;第二,“敌对国”的民众应当认识到,“你们”的领袖根本不在乎“你们”,或者至少无法阻止“我们”的行动,在被害人无助地请求下,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但是,英国政府却无能为力。所以,恐怖分子的残忍做法是向民众“揭露西方政府的虚伪面纱”,以进一步瓦解敌对方的内部舆论,甚至实现改变其外交政策的结果。

很多组织都有自己的专属网站,进行政治宣传。例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与许多具有明显倾向性的网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特网成为他们的“宣传前线”。<sup>④</sup>他们在网站上常会用一种较为“悲情”的

---

<sup>①</sup>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6, p. 16.

<sup>②</sup> Maura Conway, “Terrorism and Internet: New Media-New Threat?”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59, No.2, 2006, pp. 283-298.

<sup>③</s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Bigley](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Bigley), 2017-02-12.

<sup>④</sup> 他们建立的网站如 [www.eelam.com](http://www.eelam.com), [www.eelamnet.com](http://www.eelamnet.com), [www.eelamweb.com](http://www.eelamweb.com), [www.tamiltigers.net](http://www.tamiltigers.net), [www.cantam.com](http://www.cantam.com), [www.canadatails.net](http://www.canadatails.net), 等等。

手法来诉说本民族的“苦难经历”，控诉森加罗人是如何针对泰米尔人实行各种不平等政策，而泰米尔人又是如何奋起反抗暴政的。同时，各种“英雄事迹”“英雄生平”被展现在网站上。这些网站旨在向海外的 45 万泰米尔移民传递信息、获得支持。在其中一个网站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埃兰网(Eelam-Web)的目标是重新建立泰米尔人的传统家园，而它正在被森加罗人的政府所施行的种族灭绝政策所摧毁……政府使用完全的网络审查将他们的暴行掩盖……文化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这个网站)为那些身在海外、免于政府压迫的同胞提供丰富和传统的泰米尔文化……(我们)也将致力于呈现各种为自由而战的泰米尔人的事迹。”<sup>①</sup>这段文字利用被重新建构的“共同历史”来激发起海外移民在“面对强敌时的同仇敌忾”的热情，目的是让这些“受众”用实际行动支持反政府的分离运动。

#### (五) “挑衅与分化”策略

“挑衅与分化”的目的是使己方民众和中间人群在受到“敌国”政府发动无差别攻击后集体倒戈，从而转向更加支持或同情恐怖分子的理念及手段。所以，这种策略表现得较为间接，往往需要政府的“配合”。恐怖分子会首先对“敌方阵营”展开攻击；各国在受到袭击后，不可避免地要提升安保水平，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要进行武力报复。这一系列行动注定会伤害一些政治态度中立或较为缓和的民众，导致他们产生怨恨和报复的心理，而此时恐怖分子挑衅并分化的战略目标就实现了。

“挑衅与分化”的机制关键在于“无差别暴力”(indiscriminate violence)。耶鲁大学教授斯塔西斯·凯里维斯(Kalyvas)在分析一国内战中的暴力时提出，无差别暴力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反作用，反叛者实际上非常欢迎和期待当政者采取这种报复行动，为此，他们会主动挑起政府军对叛军的伏击，同时，这些孤立叛军最好与某个村庄相接近——这样政府的报复行为就会为反叛者带来新的成员。<sup>②</sup>由恐怖分子所引发的来自敌方政府的“无差别暴力”不仅会给民众带来心灵上的创伤，还会将错误信号传递给恐怖分子内部的不同派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大卫·莱克(David Lake)将恐怖主义细分为同一光谱上的三类：坐标的一端是那些仅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的实行类似抢劫行为的恐怖主义；另一端是极端恐怖主义，宣称一些不切实际的极端理想(如本·

<sup>①</sup> <http://www.eelamweb.com/about-eelamweb.htm>, 2017-06-21.

<sup>②</sup> Stathis N. Kalyva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1.

拉登带领下的基地组织,宣称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建立原教旨主义的政权),它们的支持者甚微;处于中间的是数量居多的温和派恐怖主义(如分离主义组织埃塔),它们通常拥有一定的社会支持,暴力的使用是为了增加政治谈判的筹码。温和派是极端派要争取的对象,所以,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发动的一些看似针对“敌对国家和民众”的攻击,本质上是为激怒“敌对政府”,并引发大规模报复行为,迫使“温和派”走向极端化,加入自己的阵营。极端派意欲向温和派展示,发动不对称和无差别报复的敌方政府实际上也是强硬而又极端,不会与他们达成可行的妥协,所以,温和派应该倒向极端的一端。通过成功运用这一策略,极端派恐怖分子能够得到更多的人财物资源及同情和支持者。<sup>①</sup>在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武装冲突中,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1992年10月,一些塞尔维亚极端分子将克罗地亚人的坟墓捣毁,并用机枪扫射尸体。这一极端挑衅的行为彻底地激怒了克罗地亚人,他们彻底否认了与塞尔维亚人和平理性的谈判可能性,认为必须发动全面的报复。<sup>②</sup>

除恐怖分子的刻意挑衅,国家作为一个重要行为体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为恐怖分子的“挑衅与分化”提供机会。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教授桑切斯(Ignacio Sánchez-Cuenca)和欧洲大学学院教授卡勒(Luis de la Calle)的研究表明,恐怖分子的“分化”策略在国家的反恐策略出现失误、双方信息掌控不完全时最容易成功。“无差别暴力”是最典型的“国家失误”。有诸多证据表明,“血色星期天”后,<sup>③</sup>“爱尔兰共和军”得到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前文提到的“埃塔”也曾采用过这种策略。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人党成为西班牙的执政党,它是继弗朗哥政权后的第一个民选政府。巴斯克地区的政治力量本以为政府态度会转向温和;但恰恰相反,为应对来自埃塔的反抗,政府成立“反恐自由大队”(Grupos Antiterroristas de Liberación)来专门执行镇压任务。“反恐大队”奉行“以暴制暴”方针,经常在毫无审判的情况下对嫌疑人实施暴力和拘禁,这一举动极大地刺激了巴斯克地区的普通人民和温和派,人们对埃塔的支持度反而有所提高。“没有什么能比安全部队肆无忌惮地将矛头指向自己

---

① David A. Lake, "Rational Extremism: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ialogue IO*, Vol.1, No.1, January 2002, p. 20.

②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0-131.

③ “血色星期天”(Bloody Sunday)发生于1972年1月30日,英国皇家伞兵对爱尔兰德里市的抗议者实施暴力镇压,造成13人丧生。

国家内部的城镇和村庄,会使人民可以更加快速的极端化。”<sup>①</sup>

同样,信息不对称也使“挑衅与分化”更易成功。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佛尔伦(James Fearon)强调,信息不对称是行为体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如果将这个逻辑应用在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中,可以认为,国家与恐怖分子关于彼此信息的误判增加了冲突的机会,也从而扩大极端派能够加以利用的空间。在很多情况下,恐怖分子也不确定敌方政府的偏好,温和派不知道政府态度和期望寻求的路线——究竟是通过和谈达成协议,还是将武力运用到底,或是对恐怖攻击一定会“以牙还牙”“零容忍”。<sup>②</sup> 所以,当极端恐怖分子的暴力袭击引发的政府武力报复时,温和派会误以为谈判对象已经失去和谈的动机或是已经被好战派控制。

#### (六)“搅局与竞价”策略

如前所述,恐怖分子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许多派别,他们不仅在战略路线上有着极端和温和之分,在利益偏好方面也有各自考量,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sup>③</sup> 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其中一些没能满足需求的派别就会试图破坏与政府的和谈成果、升级暴力,以垄断权力。恐怖分子通过“搅局”破坏政府与温和派之间的协议,通过“竞价”提升自己组织在“己方阵营”中的影响力。“搅局”和“竞价”都是在一种“竞争”的结构中进行,最终需要“己方阵营”的认可。所以,笔者将二者整合为一种策略进行探讨。

“搅局者”常出现在一些关键性节点,在这些情境下,恐怖分子内部不同派别与“敌对政府”之间的互动会发生某种重大结构性变化。例如,当国际和国内形势已经不利于该组织时,组织内部会出现分化——保守顽固派继续坚持以恐怖暴力为手段的组织策略,而倾向在体制内进行抗争的温和派则希望通过做出妥协与政府达成和平共处的局面。政府可能会选择温和派并与之谈判,以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这又是极端派恐怖分子所不愿看见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芬·斯特德曼(Stephen Stedman)认为,“搅局者只会出现在和平进程中,具体而言,就是当交战双方彼此公开承诺将要达成某种妥协,或

---

<sup>①</sup> Paddy Woodworth, “Why Do They Kill? The Basque Conflict in Spain,”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18, No.1, 2001, p. 6.

<sup>②</sup> David A. Lake, “Rational Extremism: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ialogue IO*, Vol.1, No.1, January 2002, p. 20.

<sup>③</sup> Ethan Bueno de Mesquita, “Terrorist Fac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No.4, 2008, pp. 399-418; Andrew Kydd and Barbara Walter, *The Strategies of Terrorism*, pp. 72-78.

者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的时候。和平创造了搅局者,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和平不会让所有处在内战中的领导人和派系都受益。”<sup>①</sup>所以,每当政府有希望和温和派达成某种协议或政府开始相信温和派时,极端分子就会发起恐怖袭击,破坏本就非常脆弱的互信关系——当袭击发生时,政府无法确认温和派是有意放纵极端派,还是缺乏在阵营中的权威、无法控制极端派肆意妄为,总之,政府对温和派信任会大打折扣,认为与温和派的谈判无法创造一个全面而实际的和平框架。巴以冲突中展现的各种力量互动恰恰印证了“搅局”的作用。1991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首次和平协商在马德里举行,一系列的谈判和磋商最终促成了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和平停战协议,这对于双方都是划时代的重大进展。这些协议的主旨思想是“以土地换和平”:以色列逐渐撤出占领区,而作为交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放弃武力抵抗以色列。但巴勒斯坦内部的极端派,例如,哈马斯、伊斯兰杰哈德等,将《奥斯陆协定》视为一种“投降与放弃”,在协议签订前后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暴恐袭击。这种与和平协定完全背道而驰的行为让以色列对巴解组织失去了信心,从而严重损害了执行协定的承诺。同样,2000年,当以色列领导人贝拉克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于戴维营确定了和平进程的基本框架之后,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频率再次大幅增加。(参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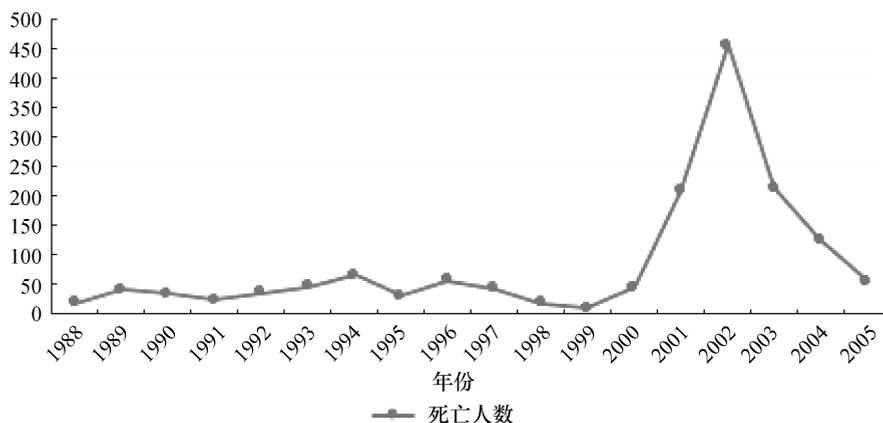


图3 以色列遭受暴恐袭击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犹太虚拟图书馆(Jewish Virtual Library)数据整理,参见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number-of-terrorism-fatalities-in-israel>, 2017-07-25。

<sup>①</sup> Stephen John Stedman, “Spoiler Problem in Peace Proc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2, 1997, p. 7.

在《奥斯陆协定》(Oslo Agreement)前后的 1992 年、1993 年和 1994 年,针对以色列的暴恐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从 1991 年的 21 人分别上升到 34、45、65 人;2000 年戴维营会谈后,2001 年和 2002 年的死亡人数飙升到 207 人和 457 人。

当恐怖分子阵营内部存在组织间的竞争时,不同组织可以采取“竞价”策略以“脱颖而出”,获得更多支持。“竞价”之所以能奏效,存在多种因素的综合。比如,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凯德(Andrew Kydd)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芭芭拉·瓦尔特(Barbara Walte),“竞价”是平民和恐怖分子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当平民面对众多的“竞争者”时,对这些行为体的真实目的及偏好很难有充分把握。恐怖组织也清楚民众的这种举棋不定,他们会适时地传递一些可以表达所谓“战斗决心”的信号,进一步“团结”和“巩固”自身的群众基础。<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竞价者”其实是斯坦福大学教授杰里米·韦恩斯坦(Jeremy Weinstein)笔下的“投机分子”,<sup>②</sup>只有表现得过分极端,才更能让民众相信他们的决心。但平民对于这种极端姿态的偏好并不是恒定的,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米娅·布鲁姆(Mia Bloom)提出,竞价是“己方社会”对和平无望的悲观情绪的消极产物。这在巴以冲突中巴方民意的变化中可见一斑:从 2000 年开始,针对以色列的自杀性炸弹袭击在巴勒斯坦民众间的支持度显著提高。“这些炸弹已经成为伊斯兰军事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中吸纳新成员的工具。它们不仅可以攻击被‘憎恨的敌人’,还授予原本边缘化的伊斯兰军事组织合法性,使它们得以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竞争社会领导权。”<sup>③</sup>1999 年巴勒斯坦对自杀式爆炸的支持度还不足 30%,2000 年这一数据陡然上升超过了 60%。究其原因,在于随着巴以冲突加深,巴方实力长期处于劣势的事实使其民众逐渐认为暴力抗争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参见图 4)

这种社会心理的结构变化给伊斯兰极端组织以可乘之机。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解放巴勒斯坦大众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阿尔阿克萨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等一批组织开始涌现,并加入到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的行列中。在这种背景下,只有表现得极端,才能获得“己方群体”的称赞

<sup>①</sup> Andrew Kydd and Barbara Walter, “The Strategies of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No.1, 2006, pp. 76-78.

<sup>②</sup> Jeremy M. Weinstein, *Inside Rebellion: The Politics of Insurgent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12.

<sup>③</sup> Mia M. Bloom,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ing: Public Support, Market Share, and Outbidding,”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9, No.1, 2004, p.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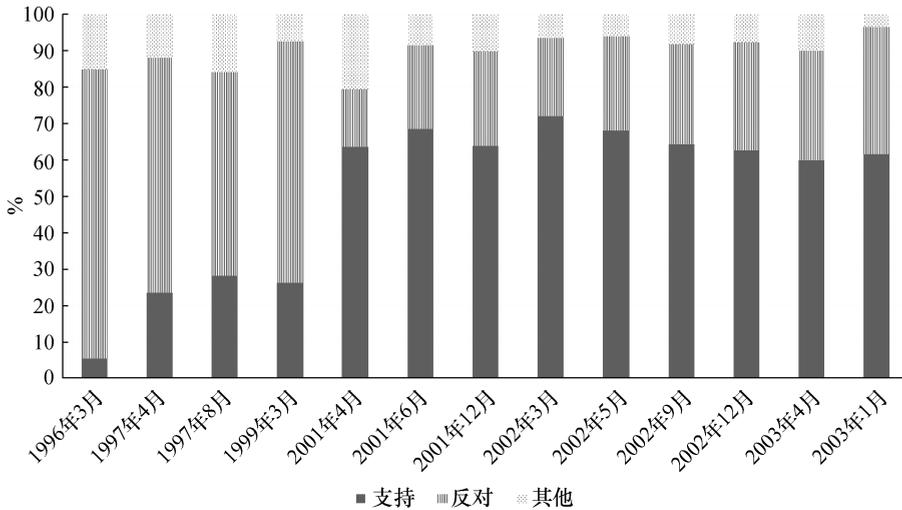


图4 巴勒斯坦民众对针对以色列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态度

资料来源:根据耶路撒冷媒体和通信中心民意调查(Jerusale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entre, JMCC POLLS)数据整理,参见 <http://www.jmcc.org/polls.aspx>, 2017-07-25。

和支持,并进一步竞得在整个“运动”中的合法性和领导权。

通过以上大量案例和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六种恐怖主义策略各自目的、目标群体和手段,笔者进一步从策略的目标群体和实现过程两个维度将其进行分类和总结。(参见表2)首先,不同策略的目标群体是解释恐怖分子行为方式的一项重要因素:恐怖组织为追求特定目标的实现,会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风格和态度。例如,按照常理思维,残杀和攻击无辜民众是典型的恐怖行为;但在笼络“己方群众”时,恐怖分子又不吝扮演公平和宽容的姿态,不仅为控制范围内的己方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甚至一些极端原教旨主义组织如基地组织,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其次,不同策略的实现过程由于互动程度的不同,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同时博弈和顺序博弈的差异:可以看出在六种策略中,威胁与恐吓、消耗、笼络与收买,以及宣传与鼓动都是恐怖分子针对特定目标采取行动并期待实现特定结果,呈现行动单向性和同时性的特点。但后两类策略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则建立在一种顺序性互动的基础上,如挑衅与分化,从行动层面上看,挑衅和威胁与恐吓的表现并无明显差异,但挑衅是通过发动攻击刺激“敌方”并引发“敌方”无差别报复实现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己方阵营的分化,把温和派和中间派推向极端。“搅局与竞价”策略也类似,“搅局”的行为举动也是发动袭击,但发动的时机不同于其他策略,一定是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极端派恐怖分子通过袭击敌方希望破坏敌方政府与

温和派之间互信关系，并进一步在内部权力结构中获得更高的地位。

表 2 恐怖主义策略的目标群体和策略过程

		目标群体	
		敌方	己方
策略过程	单向过程	威胁与恐吓	笼络与收买
		消耗战	宣传与鼓动
	顺序过程	挑衅	分化
		搅局	竞价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 四、抵制和应对恐怖主义的建议

笔者通过对概念和案例的梳理，对以上六种恐怖主义的策略进行总结，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定受众和奏效条件。理清恐怖主义行为理性的一面，是有的放矢地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五条抵制与应对恐怖主义的政策建议：

第一，树立威信，释放强硬信号，在发生恐袭时，尽可能避免恐慌的扩散。积极调动各种措施对民众进行信息引导，同时加强国内潜在受攻击对象的安保，最大可能地减少心理和物质损失。恐怖分子使用威胁恐吓、期待“消耗战”的最终成功是建立在政府会妥协的预期上的。政府释放不与妥协的强硬信号，能够有助于瓦解恐怖分子的战略意图。幸运的是，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恐怖袭击降低了政府的妥协可能，而不是提高了让步的概率。<sup>①</sup>

第二，投入民生，挤压暴恐空间。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有限，对镇压和公共物品的投入存在一个平衡。在存在国内恐怖势力的情况下，那些不能从中受益的群体就被恐怖主义的笼络和收买所吸引。<sup>②</sup> 有研究表明，改善一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险、失业保障、医疗、教育等投入）可以降低民众加入或容忍恐怖主义的动机。<sup>③</sup>

<sup>①</sup> Max Abrahms, “Deterring Terrorism: A New Strategy,”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8, No.3, 2014, pp. 1-15.

<sup>②</sup> Ignacio Sanchez-Cuenca and Luis de la Calle, *Domestic Terrorism: The Hidden Side of Political Violence*, p. 41.

<sup>③</sup> Brian Burgoon, “On Welfare and Terro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0, No.2, 2006, pp. 176-198.

第三,利用网络,转守为攻。由于网络恐怖主义的特殊性,国家很难将其准确定位并铲除。所以,单纯的“管控”思维难以奏效。事实上,恐怖分子在积极利用网络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各种信息,只要仔细观察与分析,就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比如受众、资金来源等信息)。另外,政府可以揭露恐怖分子散布的一些虚假信息,指出他们欺骗和蛊惑的性质,从而达到瓦解的目的。<sup>①</sup>

第四,积极争取平民群体,避免无差别伤害。正如上文提到的,“己方群众”是恐怖分子需要拉拢和团结的对象。为避免民众在遭受政府“无差别袭击”后产生怨恨,就要实现精准打击,因此,政府必须建立一套“选择性打击”的情报机制。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佛尔伦(James Fearon)和大卫·莱廷(David Laitin)认为,平民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地方信息”(local knowledge),只有团结和信任他们,才能得到良好的反恐效果。另外,耶鲁大学教授斯塔西斯·凯里维斯(Kalyvas)也发现,政府必须保护情报提供者的人身安全,才能建立有效的威慑。<sup>②</sup>

第五,打击极端派,实现反分化。政府与恐怖分子中的温和派在一些情况下本可以达成和平协议,但会遭到极端派的干扰。政府可以要求温和派用可靠的情报来维护这种互信。芝加哥大学教授伊森·麦斯奎塔(Ethan Mesquita)通过形式模型的方法展示了虽然政府对温和派的让步会导致暴力在短期内升级,但只要双方建立类似“以牙还牙”的互信,合作会在中长期产生积极的回应。<sup>③</sup>

当然,以上这些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在讨论“恐怖主义”概念时,应该注意到,恐怖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要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惧,以小规模的受害者来威慑更广泛的民众,迫使政府改变既有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耗”与“恐吓”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我们很难认为“9·11”事件仅是基地组织通过摧毁美国金融中心标志物来造成西方世界的物质损失,它必然有心理威慑的意图;“伊斯兰国”于2015年连续对巴黎实施恐怖袭击,除了给普通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之外,也加重了法国在安保方面的投入。政府在制定反恐政策时,既要充分把握各种恐怖策略特点,也要分析单一袭击背后可能会存在的多重意图和影响,综合考量反恐政策的近期和远期效果,实现预防性遏制的目标。

---

① James A. Lewis, "The Internet and Terrorism,"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9, No.1, 2005, p. 115.

②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1, 2003, pp. 88-89; Stathis N. Kalyva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8-196.

③ Ethan Bueno de Mesquita, "Conciliation, Counterterrorism, and Patterns of Terrorist Viol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2005, pp. 148-164.